

陶懋炳著

中国 古代 史学 史略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史学史略

陶懋炳著

DA4/2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2603

湖南人民出版社



1132603

中国古代史学史略

陶懋炳 著

责任编辑：彭兆平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 插页：2 字数：289,000

印数：1—3,600

ISBN 7—217—00236—2/K·20

统一书号：11109·415 定价：3.65元

湘人：87—7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期——先秦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史学的萌芽 (11)
 - 一 和神交通的人——“史官” (11)
 - 二 远古神话传说 (13)
 - 三 萌芽状态的历史记载 (17)
- 第二章 春秋战国的史学 (25)
 - 一 编年史的出现和孔子作《春秋》 (26)
 - 二 战国的史书 (34)
 - 三 战国诸子史论 (45)

第二编 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期——秦汉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史学之父司马迁 (62)
 - 一 司马迁撰《史记》 (62)
 - 二 《史记》优美精湛的文学手法 (72)
 - 三 《史记》的史学思想 (79)
- 第二章 班固和汉朝其他史家 (99)
 - 一 班固的时代、生平和学术渊源 (99)
 - 二 《史记》的续作和班固撰《汉书》 (106)
 - 三 《汉书》的编纂及其博洽 (109)
 - 四 《汉书》的正宗思想和折衷主义 (114)
 - 五 《东观汉记》和《汉纪》 (119)

第三编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期——魏晋至唐前期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的几部正史	(131)
一	陈寿和《三国志》	(131)
二	范晔撰《后汉书》	(144)
三	南北朝所成的另三部正史	(160)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的其他史著	(169)
一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风尚	(169)
二	魏晋南北朝的各类史书	(171)
三	魏晋南北朝史书大量亡佚的原因	(182)
第三章	唐前期的史学	(185)
一	隋亡唐兴带来史学的兴旺	(185)
二	《唐八史》和魏征的史学思想	(190)
三	官修史书的确立和唐前期的 其他史著	(203)
第四章	杰出的史论家刘知几	(208)
一	刘知几撰《史通》	(208)
二	《史通》论史学方法	(215)
三	《史通》的进步思想	(222)
四	刘知几的学友	(229)
第四编	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期——唐后期和辽、 宋、金、元(八世纪后期至十四世纪初)	
第一章	杜佑和唐后期的史学	(243)
一	杜佑撰《通典》	(243)
二	杜佑的史学思想	(251)
三	唐后期的其他史著	(265)
第二章	北宋前期的史学和欧阳修	(274)
一	五代和北宋前期的史学	(275)

二	唐史、五代史的重行修撰	(281)
三	欧阳修的史学贡献	(288)
第三章	司马光及其巨著《资治通鉴》	(295)
一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	(296)
二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301)
三	司马光学派	(317)
四	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	(320)
第四章	郑樵和南宋史学	(324)
一	郑樵撰《通志》	(324)
二	郑樵的史学思想	(330)
三	南宋史学略述	(338)
	当代史的几部要籍	(339)
	前代史、古史、杂说	(344)
	理学大师朱熹的史学	(345)
第五章	马端临、胡三省与元代史学	(350)
一	马端临和《文献通考》	(351)
二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366)
三	元朝史学	(375)
	元修辽、宋、金三史	(375)
	《蒙古秘史》和元朝官修当代史书	(381)
第五编	中国古代史学的晚周期——明清(鸦片战争以前)	
第一章	明代的史学	(389)
一	明修《元史》和宋濂、王祎	(390)
二	《明实录》、《永乐大典》和《明会典》	(397)
三	李贽的史论	(403)
四	谈迁撰《国榷》	(411)

第二章	明清之际三大师——黄宗羲、顾炎武、 王夫之	(416)
一	黄宗羲	(416)
二	顾炎武	(429)
三	王夫之	(446)
第三章	乾嘉考据学派	(461)
一	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	(464)
二	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	(469)
三	赵翼撰《廿二史札记》	(476)
四	崔述撰《考信录》	(484)
第四章	章学诚——我国古代史学的殿军	(495)
一	经世致用	(496)
二	论史学撰述	(505)
三	论历史文笔	(510)
四	论方志的编撰	(513)
余论		(522)

前　　言

史学史是属于文化史范围内的一门专史。它的任务是总结前代史学成果，寻求史学的发展规律，为历史科学的研究提供经验教训，以期革旧创新。我国史籍浩若烟海，历代绵延不绝，非其他文明古国所能比拟。要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不但要鉴取近代中外史学的经验教训，还必须从我国古代史学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史学的遗产，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寻求其规律，以推陈出新。这就是中国史学史的任务。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主要应从几个方面着手，来考察我国古代史学的遗产。

首先要考察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漫长的数千年间，我国古代史学领域里的基本矛盾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天命与人事、崇古与疑古、株守不变与因时变革、神学与无神论、爱国思想与卖国谬论、曲笔阿世与直言不讳等等的争论和斗争。这种种矛盾因时而异，因势而移，情况是错综复杂而又迂回曲折的，既有相互斗争，也有相互渗透。对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深入考察，而切忌简单从事，断以一切之论。在我国史学史上，代表各个时代精华的史学家辈出不穷。虽然古代生产规模和社会制度的局限，决定了他们的史学思想无法达到近代的高

度，更谈不上达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高度，并且他们自身的思想中都无例外地存在着无法调谐的矛盾，但是，他们的光辉思想正象漫漫长夜中的篝火，放射出瑰丽无比的奇光异彩。尤其值得瞩目的，就是在我国古代史学家及其著作中，有不少的科学性的因素，并且这种因素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渐增多。认真研究这笔丰富、珍贵的思想遗产，对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显然是有重大意义的。

除了考察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之外，史学研究还存在着技术方面的批判继承问题。史学的技术方面包括史学编纂、史料考订和历史文学。

我国古代史学编纂之种类繁多、体裁多样，为举世所仅见。大略言之，有编年体、记言体、纪传表志（或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谱牒、方志、史评、学案、订谬等等，而稗史野乘、杂说偏记还不在其列。我国古代史籍不但包括通史、断代史、地方史，也包括与边疆民族和外国的交往史；不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学术、文艺、典章制度诸方面，也包括宗教、民俗等方面。其体裁之多，内容之广，都是惊人的。

我国古代史著不但讲求体例，而且注意考证。我国古史的注释考证，最初局限于音韵训诂和阐述经义，尔后发展到补漏、纠谬、考异、议论，由从文献考证到访问调查以及运用金石，不但出现了专书，而且由此发展出一批综合古今、有卓越识见的不朽之作，例如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些史学专著，显示了我国古代史学家们高度的聪明智慧和惊人的刻苦勤奋。科学地探讨和总结这些史学专著，不但能使我们看到我国古代史学遗产之可贵，而且有益于我们创立和完善新的史书的体裁、体例。

我国古代史学名著的作者都能运用高明精湛的文学手法记人叙事、说理发论。描写人物能精确地刻画其性格，突出其特点，使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叙事能前后贯连，多方衬托，把复杂的过程、庞大的场面，用简要生动的文笔勾画出来，不但有条不紊，而且气势磅礴，引人入胜；评议说理，不仅论据充分，而且善于引喻，层层深入，娓娓动人。这些都是同时代的外国史家所难以企及的。在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优秀的历史文学，是在同追求形式、盲目崇古、官样文章、陈词滥调、浮说空谈等等恶劣文风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国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学的文风，至今仍可供我们借鉴。

我国古代史学家，留心总结前代史学成果、提出创新设想的，不乏其人。刘知几撰《史通》，章学诚作《文史通义》，都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尽管他们的史学思想有不少精彩之处，倡议有不少卓越之见，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他们却终究没有探索出史学发展的规律，更无法提出根本改革的方案，这是各种条件的限制所致。近代史学宗师梁启超曾经企图探求史学的发展规律，主张从根本上改革旧史学。他指斥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提出新史学的三大任务：叙述进化现象以区别历史循环的观点；叙述人群进化现象以区别旧史以单个人物为主的观点；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梁启超这些言论在当时对人民确实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但他没有认清本质问题，自然也就寻求不到他所说的“公理”、“公例”即发展规律，就象面临着广阔无际的大海，只见波涛汹涌，而不识其他。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虽然有不少合理的成分，以致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是谈不上根本的改革。解放前治中国史学史的学者中，功力坚实者莫过于金毓黻先生，然而他所著的《中国史

学史》仍基本上限于目录学和编纂学，资料虽充实，考证虽严谨，但终究谈不上寻求史学的发展规律，当然也就提不出根本改革旧史学的宏伟方案。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肩上。

研究史学史，必须把史学的发展置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而不能撇开整个历史的发展孤立地研究史学的发展。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自然就无法寻求出史学发展的规律。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把对它的研究置于各个时代的思潮之中，恰如其分地评定其作用和地位；同时，还必须把史学同各个时代的文学、哲学等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史学的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应该把研究各民族史学的发展置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之中。尽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困难很多，但必须认真开拓。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先要从各个时代的史学代表作入手，认真总结，然后有步骤地向纵深发展。研究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尤应如此。为了弄清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和它在世界史学发展中的地位，我们还必须把中国史学与各个相应时代的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史学相比照。

目前，史学界开始研讨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问题。对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各家之说都有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将会产生有益的效果。在这里，我不自量力，谨就管见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我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可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期——先秦

夏代是氏族制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史籍记载的夏代史事，皆系后人据传说而追记，其中夸张、虚饰之词很多，不足征信，

何况至今尚未发现夏代文字，因而在夏代无史学可言。商代是早期奴隶制国家，有了文字和历法，并开始有了不完备的史料（或文字记载）。从西周起到秦的统一，奴隶制社会由登上发达期的高峰到逐渐解体，最后为封建制所取代，史学也就是循着这个轨迹而发展的。西周出现了仅具雏形的各国编年史，鉴戒史学也在此时萌芽。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先有私家讲学、撰史出现，然后发展到百家争鸣和史籍迅增。虽然在此时经、史、子难解难分，但无论是史学观点、历史编纂还是历史文学等，都为我国史学达到成熟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史学的许多优良传统也肇源于这个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期——秦汉

秦汉是我国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时代，也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建立和巩固的时代。汉朝呈现出的繁荣昌盛的局面，学术界的由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社会矛盾和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这些条件开拓了史家的眼界，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史学便逐步成长，继而迅速发展起来。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臻于成熟。《史记》不但成为我国史学史上的珍贵遗产，而且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东汉班固撰的《汉书》，为断代纪传体史书不祧之宗。《汉书》对《史记》的承袭，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赞颂和指责，显示了正宗史学跟异端史学的斗争，也显示了后人对前人的继承。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期——魏晋至唐前期

由三国、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割据到隋朝统一，再到“三代莫俦”的大唐盛世，门阀世族由盛而衰，至于没落，民族融合在经历了长期艰难痛苦的斗争和摩擦后出现了新

的局面，国势的富强和显赫，中外往来的频繁，这一切，都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史学的学术地位由经部的附庸跃居于与经部比肩的史部，史籍的种类、数量激增，为前所未见；由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封建国家逐步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而学术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现象的增衍，又使修撰史书成为私家难以胜任之事，官修史书自此成为定制。史学的空前发展，向史学家提出了总结前代史学的历史任务，遂有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撰成《史通》这一不朽巨著。《史通》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史学即将攀上另一更高的峰顶，进入繁荣期。

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期——唐后期迄于宋元

从唐后期至宋元这几百年间，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科学技术取得很大进步，印刷术已经流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一切都为史学的繁荣提供了条件。由于史籍浩若烟海，撮要括菁撰写通史已成为一种必要，于是，《资治通鉴》问世了，纪事本末体也得以正式确立，编年体史书又由此跻于纪传体正史之上。这时，以典章制度为内容的史学著作接连问世，《九通》与《廿四史》并驾齐驱，会要、会典代出，方志学也由此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史学思潮方面看，随着我国封建社会进入新的阶段，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方面有了一些调整和变革，意识形态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部分的更新。反映在史学方面，则是疑古思潮影响重大，五德终始、阴阳图谶等神学理论一蹶不振，史学思想则十分活跃，其民主性精华和科学性因素大大增加。宋以后，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史学领域内的思想斗争每每涉及理学。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史学也得到空前的发展，《辽史》、《金史》的撰成，《蒙古秘史》的问世，都是重要的例证。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以宋代

为高峰，在元末则趋于没落。

中国古代史学的迟滞（或衰落）期——明和清前期（鸦片战争以前）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统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顶点而呈现出僵化之势，闭关自守使中国与外界形成隔绝之势，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空前猖獗，思想禁锢日益严酷，中国古代史学进入了一个迟滞期。但这并不说明这个时期的史学全无成就或直线下降，因为人们的认识的进程是曲折而复杂的。约在十六世纪末，思想界和史学界的气温开始回升，十七世纪后半叶达到了一个高潮。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涌现出来了，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史籍。就是在“万马齐喑”的雍乾嘉三朝，史学注疏、考证等方面也是卓有成绩，并且胜过前代的。章学诚撰的《文史通义》，提出了不少有识之见。它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反映了史学编撰势在必改的趋势。确实，与同一时期的西方诸国相比，中国此时期的史学在思想和方法上显得相当落后，中国史学到了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时候了。



第一编

中国古代史学的 童年期——先秦

